

读天下

冯友兰的书斋

马 嘶

哲学界一代宗师冯友兰先生一生饱经沧桑,几乎历尽一个世纪。他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是清华和北大,他沉潜得最久的便是清华园乙所被学生戏称为“太乙洞天”和北大燕南园他自称为“三松堂”的两个书斋。

清华园乙所“太乙洞天”

冯友兰1918年6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次年考取公费留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哥大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河南中州大学,1925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26年去北京燕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28年10月就任清华大学教授兼秘书长,从此长期在清华任教。

初来清华,冯友兰住南院17号,1930年4月迁到乙所。1917年建成的清华园甲、乙、丙所,专供校长、副校长、秘书长居住。上任时迁入,离任时迁出,条件极为优越。

几十年后,冯友兰之女、著名作家宗璞在《那青草覆盖的地方》一文中,这样描绘乙所的环境:“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片小树林……树林的西南有两座房屋,当时称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长住宅。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流往工字厅的荷花池……从此,我便在树林与溪水之间成长。”从1930年起,冯友兰就住在这个幽雅静谧、极富园林野趣的环境里,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南迁。

那时,清华是以“教授治校”作为办学方针,教授的地位极高,

像神仙般至高无上又自由自在,学生把乙所戏称为“太乙洞天”,也就把学贯中西又具仙风道骨的哲人冯友兰看作是“太乙真人”。住在“太乙洞天”的冯友兰,自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的幽雅谧的书斋。

宗璞在1995年5月写的《向历史诉说》一文中,以简洁的文字高度概括了冯友兰的书斋生活:抗战前,在清华园乙所,他的书房是禁地,孩子们不得入内,但是我们常偷偷张望。我记得他伏案书写的身影,他听不见外界的一切,他在思想……思想是通向觉醒的过程。父亲把人类有思想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他生活的最大愉悦就是思想。

冯友兰在清华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那几年中,他写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1929年完成了上半部,1933年全部完成,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的成名之作,它开思想史、哲学史的“释古”方法之先河,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冯友兰的这些学术追求和成就多是在乙所书斋里进行的。这个被孩子们视为“禁地”只能“偷偷张望”的书斋,便是冯友兰的生存空间。就是他“在思想”的安身立命的一方天地。他在这个并不宽敞的空间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地思想着,而且同周围的学者们不断地交流思想、切磋学问。他任清华秘书长到任文学院院长,他一直不停地地思想着、探索着,为形成清华学风起到了融融交汇与大胆张扬的积极推动作用。因可以说,他是个既沉潜于书斋生活又勇敢地走出书斋,使他的学术之光向五洲四海

发射的学者。

北大燕南园“三松堂”

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三松堂”是冯友兰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寓所,他的后半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1981年写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写道:“‘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有人把冯友兰一生的经历概括为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后回归自我的思想历程。若是这样,他的前半生(即住在清华园乙所前后到抗战前后)是实现自我的时期,后半生(即住进北大燕南园后)是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的时期。

笔者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进校不久,常常在燕南园附近遇到一位蓄着长髯的长者,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中握着一根手杖,腰杆挺得很直,昂首阔步地前进。他神态自若,旁若无人,走得沉稳而快速。第一次与他相遇,笔者的心中不由怦然一动。

凭直觉判断,这是一位杰出人物。在北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名教授不一定都住在燕南园,但燕南园住着的必定是名教授。因此,可以肯定这位必定是位名人。他常常是从美丽的燕南园那边走过来,徘徊在未名湖畔的石径上。那根手杖只是在 he 手里握着,并不拄在地上,有时又扬得老高。他的筋骨是健壮的,全身透出一股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气。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先生。其实,在我们总是用钦羨的目光去注视这位尊者之时,正是他失落自我的痛苦岁月,他在无休止地进行自我检查和接受别人的批判,而且在哲学系被不正地定为四级教授(后来才恢复为一级)。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解放后按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再到一下子被降为四级教授,他始终住在只有名教授才有资格住的燕南园,而且又常常陪同学校领导去接待重要人物,这实在是不能解释。

燕南园“三松堂”和清华园“太乙洞天”皆是宜于治学、思想、著书的幽雅所在,只是此时与彼时,主人的心境大不相同了。在清华园乙所时期,冯友兰的心境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来到“三松堂”,始则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惆怅,继而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



晚景了。不过,他始终是以“流连光景惜朱颜”的感慨,做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力冲刺,完成了他人生价值的极致。

冯友兰30多年的“三松堂”生活是一个长长的思想历程,包括了痛苦的思想求索与治学死里求生的嬗变与蜕变。总之,是一位思想家、哲人、大师,体验人生、研究人生、参透人生,战胜人生从而睿智、完整地解释人生的哲学过程。

“文革”十年,冯友兰完全失落了自我,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三松堂书斋也成了个“空巢”,他似乎成了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之身。然而,物极必反,随着他通过半生艰苦努力所取得的优厚待遇被取消和亲人的逝去,这种“无牵挂”的精神状态又使他陡然警醒,成为他回归自我航程的起点。“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凭我自飞。”于是,他又回到书斋中。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撰写《三松堂自序》。此时,中国已进入了新时期,他已是86岁高龄了。

此后,他又以耄耋之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说:“我現在就像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去的草再吐出来细嚼慢咽,不仅津津有味,其乐也就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吧!”

宗璞是这样记述父亲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80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本书。

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

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

冯友兰重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共7册,总计150万字,从1980年写到1990年4月。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又活了100多天,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仙逝。

关于冯友兰在书斋里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的生活工作状态,作者范鹏在《道通天地·冯友兰》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从此后,冯友兰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刻板,他的工作亦整齐划一。每天早上,从卧室传来一阵阵呛咳,那便是他的起床号。然后,慢慢地摸索着走到自己的“岗位”上,让史料在“眼前”过电影,让思想在口中吞吞吐吐地冒出来,笔录者一丝不苟地记下来。当他自觉完成一节后,让助手念给他听,他不仅目已盲,而且耳失聪,可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听。他不愿浪费上午近3个小时工作时间的每一分钟,甚至为了不因上厕所而中断工作,一上午几乎滴水不进。除非晕倒住进医院,他几乎没有中断过一天工作。

中午坚持午睡。

下午闭目静坐,时而嘴唇微动,他在思想,在构思。

第二天,重新开始滔滔不绝地口授。

早晨收听广播,下午听人读报,其间做一遍“去病延年二十式”,借以活动肢体舒展筋骨,这些也是固定的“功课”。

这便是冯友兰晚年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本文摘自岳麓书社2010年1月出版的《观澜文丛》)

拾音阁

在“对话文明”中聆听古典的回响

熊文军

传说古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又据《说文解字·叙》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相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知古人对写作将会科带来的灾祥有着本能的恐惧,文宇的产生也本是一件让人敬畏的对神圣行为的模仿。可在今天,写作的神圣化和对文字的敬畏感似乎越来越淡薄了。放眼当下的阅读市场,所谓的畅销书占据了图书市场的绝大份额,对应的是读书变得越来越注重实用性、功利性和“轻松有趣”。也许在一个几乎什么都可以“快餐化”的现代社会里,大多数人沉醉在一种“啃甘蔗”式的读书中——只讲究片刻的过瘾,而全然不顾汁水既尽,唯余满嘴沉渣,少了古人读书如食橄榄式的余味悠长。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讲,他依然沉醉于在浩淼的书海中去寻觅一部真正的书,一部包含着真理与经典、充满人性温暖、给人带来启迪和精神陶冶的书。《古典与现代》就属于这样一本读书人真正要寻的书。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辑中文章执笔者虽多为知名学者,但集结于此所编发出的文章,都一改往日学术图书中“学院式”写作的冰冷面孔,篇篇见情见性,实乃为当下真正的读书人构筑了一片精神净土。

置于全书之首的是由张丰乾

执笔,对著名汉学家杜维明的访谈——《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在这篇访谈中,杜维明教授以开阔的文化视野,重点谈了在新的形势之下,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上的沟可形成的融通互补,谈不同宗教、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应当具备的“听德”意识。归结为一点,是讲求中外文化与文明打通齐观的一种开放意识,用杜维明教授的话是“对话文明”,在“对话文明”中互通有无。在今天,一切地方文化都不再可能独立运转,而成为全球文化;多元文明间对话互动的日趋频繁和日趋深广已是不争的事实。想来这也是《古典与现代》强调“接异域之气”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杜维明教授的这篇访谈录诠释和深化了《古典与现代》自我期许的理念与格调,那么这篇《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关于灵魂及文人的事情》所探讨的“文人与灵魂”的话题则构成这期丛刊的统摄性主题。文章是10年前的旧文,是作者在千禧年末对

个体外在求学成长经历与内在精神游历所做的一篇总结,但是10年来读来依然能感受到文字内在的呼吸。在个体的生命游历中,作者细述世界各类宗教及宗教教义,做着灵魂有无的“天问”。在确证人不仅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更是“一棵有灵魂的芦苇”下,焦灼的追问化作了内心的安宁。浸溺在文字裹挟来的情感浪潮中,笔者更愿意把这种个体心灵史的追溯读作一大批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描摹。他们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承受了历史所带来的生活磨难和难以愈合的情感创伤,但他们最终依然守护着精神与灵魂的纯洁,思考着自身的价值。他们以学术为志业,但更注重学术背后的思想和对当下社会、人文的关怀,默默承担着自我授予(更是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所授予的)责任与义务。

在一个古典离我们愈来愈久远、几成绝响的时代,《古典与现代》试图在跨越中外文化的“对话文明”中会通古典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于活得匆忙、来不及思考的现代人来说,《古典与现代》提倡一种阅读和生活的“静”与“慢”来应对现代时间的“快”。在“静”中学会沉思、学会聆听;在“慢”中学会驻足、学会回望。

(《古典与现代》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徐悲鸿绘画鉴赏》

该书通过对徐悲鸿绘画作品的鉴赏,希望读者在图文互动中全面了解徐悲鸿艺术,深切体会其艺术的独特魅力。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杰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他热爱艺术,擅长素描、油画、国画,培养并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被称为“中国现代绘画之父”。徐悲鸿绘画熔古今中外画法于一炉,显示出广博的艺术修养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油画融合西方写实技法等绘画因素,表现出深厚的写实功力。他立足素描,革新中国画,建立了新型美术教育体系。他的中国画,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西洋画法,为中国画的革新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唐培勇 赵辉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在1968年至1980年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大约1700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这对整整一代青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打乱了几百万有关青年(数量大约占那一代人的一半)的生活秩序,而且影响到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整个社会。该书作者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迷惘的一代”,同时也是“思考的一代”。这场运动在所有知青的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最后只能用舒婷的诗来真切表达他们的感受: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法〕潘鸣啸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篆楷字汇》

篆字是一种什么字?从广义上来说,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及春秋战国时流行于六国的文字和小篆。狭义上则指籀文(大篆)和小篆,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篆字。对篆字,我们似曾相识,却更感陌生。它虽然美观但难读、难写、难查。《篆楷字汇》以篆字为主体研究对象,以篆字为字头,以篆字字形为基点,以繁体楷书为参照,以简化楷书为标尺,以汉语拼音为纽带,且具有篆一楷和楷一篆双向检索功能,在汉古文字篆字和现代楷书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较好地解决了篆字识读等问题,为古文字、考古、收藏、书法等爱好者和专业人员提供了便利。

(殷南安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燃烧的男孩》

近日,李枫首部长篇小说《燃烧的男孩》一书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步上市。李枫是“青春文学第一刊”《最小说》杂志的人气作者,第一届“文学之新”大赛人气选手。《燃烧的男孩》以第一人称讲述了5个不幸的孩子相互陪伴、彼此支撑,共同面对外界的欺侮与各自家庭的变故,最终却分崩离析的故事。对于作者和作品,作家刘震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枫是第一届“文学之新”大赛选手中,我最为欣赏的一位。他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物关系和作品结构,拥有充分的想象力,情节、语言和人物描写的能力也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燃烧的男孩》感情真挚,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李枫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门萨的学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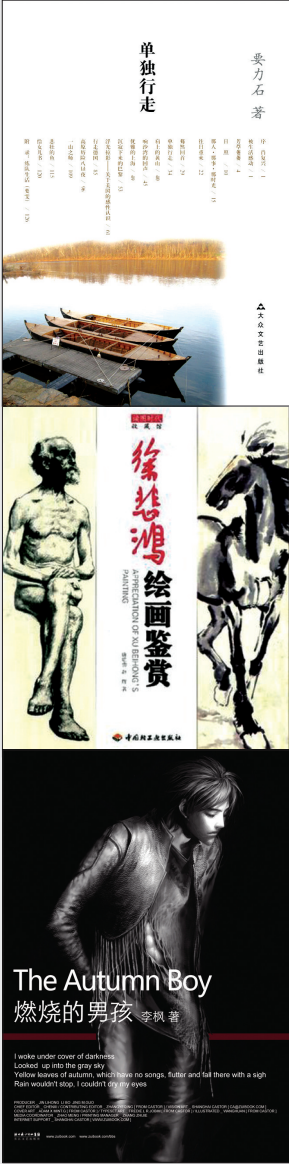
李海洋是“80”后代表作家,著有《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乱世之殇》等长篇小说。《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在《萌芽》杂志连载数月,声名鹊起,成为了2004年《“萌芽”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李海洋以鲜活有张力的文字、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真实地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热望,成长的叛逆与迷惘,让人在感受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的同时,还发人深省。但继《乱世之殇》之后,李海洋沉寂了多年,开始潜心写作他的第三本小说《门萨的学徒》。这本小说可以说是李海洋的转型之作,是他告别青春时代的作品。

(李海洋 著 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单独行走》

出版人要力石的散文新作《单独行走》近日出版发行,著名作家肖复兴为新书作序。书中收录的30余篇精炼散文,记录了作者20余年来感人的生活点滴和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悟。正如作家肖复兴在序中所言:“他的心是敏感的,笔是勤奋的,纵使劳务繁忙,行色匆匆,那一缕属于散文的情怀是割舍不断的……”书中收入的散文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读者在享受散文之美的同时,还可以触碰到身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代人的心灵世界。

(要力石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序与跋

又见改琦红楼人物画

钟 舒

《红楼梦》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朽名作,长期以来,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巨大的艺术魅力和广博的知识范围,深深地吸引和感动着广大读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正是由于《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各种以《红楼梦》题材为主体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作为人物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就是清后期改琦的红楼人物画。

改琦,字伯韞(蕴),号香白,又号七芑,别号玉壶山人、玉壶仙叟、百蕴生,生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卒于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其以仕女、佛像画享誉清代画坛。据《清史稿》记载:“琦,通敏多能,工诗词。嘉、道后画人物,琦者最工。”改琦出身于官宦世

